国故论衡

章太炎／撰

陈平原／导读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国故论衡

章太炎／撰
陈平原／导读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故论衡 / 章太炎撰；陈平原导读. —上海：
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.5
（蓬莱阁典藏系列）
ISBN 978-7-5325-8901-2

Ⅰ.①国… Ⅱ.①章… ②陈… Ⅲ.①国学—研究—
中国—近代 Ⅳ.①Z126.275②B25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2112号

蓬莱阁典藏系列

国故论衡

章太炎 撰 陈平原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（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）
（1）地址：www.guji.com.cn
（2）E-mail：guji1@guji.com.cn
（3）易文网网址：www.ewen.co

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7
插 页 5
字 数 115,000
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5-8901-2/K·2511
定 价 31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，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。面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，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。士人的眼界既开，学殖又厚，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。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，跳出旧传统的窠臼，拥抱新思想的精粹，故其成就者大。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，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，希冀借助今之专家，诠释昔之大师，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、文化背景等。是以本社编有“蓬莱阁丛书”，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，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，因借

取而为丛书名。“蓬莱阁丛书”推出后风行海内，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。今推出“蓬莱阁典藏系列”，萃取“蓬莱阁丛书”之精华，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，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《国故论衡》导读

陈平原

不管你认定他是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，还是“有思想的学问家”[①]，你都不能不承认，章太炎（1868—1936）是晚清最特立独行、也最丰富多彩的人物。如此江山，如此人物，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，还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当初“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旺”的“战斗的文章”，今日已不太为人关注；那刊落“驳难攻讦”之作，自以为足以“昭示后世”的《章氏丛书》[②]，也不见得有多少真正的读者。留在世人记忆里，更多的是太炎先生的逸事与隽语[③]，比如“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”，或者“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，我是有神经病”，因“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，必得有神经病，方能做到”[④]。

对于著名学者来说，有众多“逸事”、“隽语”以供流传，真说不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因这既使得其声名远扬，又妨碍其著述被认真阅读。知其名却不读其书，对于学者来说，近乎买椟还珠。读其著述，而后观其逸行，品其清言，这才是“欣赏”学者的最佳途径——即便对于章太炎这样有显赫事功的民国元勋，也不例外。

谈论章太炎的专业著述，世人多以 1900 年初刊本《訄书》为代表，因其出版在先；而我则更喜欢 1910 年刊行的《国故论衡》，因其更能代表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。

一、学术史家的自我定位

善读书者，无不注重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（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），这点古今中外几无例外。太炎先生的特出之处在于，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、著述或思潮的考辨，而是“全史在胸”，借助旧学新知的融会贯通，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，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。如此强烈的学术史意识，虽未催生贯通古今的通史，却也为后来者开无数法门。这一点，思想史家侯外庐有言在先。在《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》中，侯称章为“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”：

他关于周秦诸子，两汉经师，五朝玄学，隋唐佛学，宋明理学，清代学术，都有详论，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“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”，亦颇有意义。实在讲来，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，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，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，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，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的材料编著起来，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，多难发觉。[5]

经学史家周予同大概也可以认同这一说法，因其在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中，曾专门提及章太炎的《检论》和《国故论衡》：“这两种著作，是中国学术批判史。”[6]

说章太炎是最早“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”，这没问题；但要说“第一位”，则很可能不无争议。因为，如果强调著述之“有系统”，则梁启超 1902 年在《新民丛报》上连载的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其整体框架、理论术语以及论述线索，比刊刻于 1900 年的《訄书》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“学术史”。其实，是否“系统”，谁人“第一”，并非关键所在；最要紧的是，太炎先生关于五朝玄学或清代学术的诸多论述，至今仍被研究者奉为圭臬，可见其著述生命力之长远。

我想追问的是，如此目光如炬的学术史家，如何看待自家的写作？对学术史人物的褒贬，与对自家专业著述的抑扬，二者即便不说互为表里，起码也颇多内在联系。那么，就让我们借助作为学术史家的太炎先生之自我定位，来凸显《国故论衡》的意义。

1915年12月23日，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，给女婿龚宝铨写信，嘱其将《章氏丛书》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。信中有这么一句：

《国故论衡》原稿亦当取回存杭，此书之作，较陈兰甫《东塾读书记》过之十倍，必有知者，不烦自诩也。⑦

将自家著述与清人陈澧的《东塾读书记》相比拟，而且自认更胜一筹，并非一时意气。在《自述学术次第》中，太炎先生提及当初之发奋著述，乃有感于“汪容甫略推墨学，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，而粗末亦已甚”；正是意识到“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”，方才起而“补前人所未举”：

余所撰著，若《文始》、《新方言》、《齐物论释》及《国故论衡》中

《明见》、《原名》、《辨性》诸篇，皆积年讨论，以补前人所未举。其他欲作《检论》明之（旧著《訄书》，多未尽理，欲定名为《检论》，多所更张）。⑧

至于1928年成稿的《自定年谱》，在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条则有云：

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，提奖光复，未尝废学。……先后成《小学答问》、《新方言》、《文始》三书，又为《国故论衡》、《齐物论释》，《訄书》亦多所修治矣。

如果说私人通信受具体事宜的制约，有可能思虑未周；《自定年谱》和《自述学术次第》则是很严肃的著述，起码体现太炎本人的“自我定位”——尤其是在学术史方面。

辛亥革命胜利后，章氏弟子大举入京，占据北大讲坛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“时危挺剑入长安”（《无题》四首之一），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，后又因反袁被囚禁，使其声望如日中天，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《国故论衡》为荣。据顾颉刚称，当初因国文教师、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，再加上当面听过太炎先生讲演，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，“因此，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，依了次序，按

日圈点诵读”[9]。而比顾低两级、1915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，那时也在教师指导下重点阅读八部书（外加司马谈的《论六家要旨》）。顾、陶二君所开列书目，重叠部分有《文心雕龙》、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、《国故论衡》四种。据陶君回忆，是国文教师沈尹默“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《国故论衡》读习”的。当时北大文科教师之所以着力推荐《国故论衡》，我想并不全是学派之争或师生之谊，其中也包括此书“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，摆在读者面前”[10]。

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推进，西学大潮汹涌澎湃，引领中国学界风骚的，一转而为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。至于章太炎等博雅的晚清学人，则逐渐退居二线。但这不等于说，章太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从此消失。或许，就像毛子水在追忆傅斯年时所说的，只因当初十分崇拜，用力较深，知其利也知其弊，日后提及时反而可能出言不逊[11]。辨析那些自以为彻底告别《国故论衡》的青年才俊，我们依然能够在其蹒跚学步的足迹中，发现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[12]。

二、“精心结构”的“著作”

民国初年，北大教授为何极力向学生推荐《国故论衡》，而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是太炎先生同样精深的其他著述——比如“可谓一字千金矣”的《文始》和《齐物论释》[13]？道理很简单，就因为前者更能完整体现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，也更适合于刚入门的大学生阅读。1910年初刊行于日本的《国故论衡》，共分三卷，上卷小学十篇，中卷文学七篇，下卷诸子学九篇，合起来，恰好涵盖其时“国学研究”的各主要领域。此前出版的《訄书》、《文始》固然精深，但论述范围相对狭小；日后问世的《国学概论》、《国学讲演录》包罗更广，可又属于通俗讲演。直到现在，如果要挑一本既精且广、能大致体现章氏学术创见的著述，非《国故论衡》莫属。

《国故论衡》虽然也是各章独立撰写，而后才结集出版，但最后凝集而成这上中下三卷，还是显得很有条理。正是这种各文之间互相呼应，以及全书的结构完整，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。因为，在胡适看来，中国学者擅长局部的专深研究，但缺乏系统的眼光以及融会贯通的愿望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第一章“导言”中，胡适提到整理史料的方法有三：在“校勘”、“训诂”之外，还得加上至关重要的“贯通”。通过对具体著述的阐释与贯通，“寻出一个脉络条理，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”，这不只牵涉阅读眼光，更是把握全局的结构意识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胡适敏感地意识到，章太炎已经走出了清学的藩篱：

清代的汉学家，最精校勘训诂，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功夫，故流于支离碎琐。校勘训诂的工夫，到了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，可谓最完备了，但终不能贯通全书，述墨学的大恉。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，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。太炎的《原道》、《原名》、《明见》、《原墨》、《订孔》、《原法》、《齐物论释》，都属于贯通的一类。《原名》、《明见》、《齐物论释》三篇，更为空前的著作。[14]

适之先生评价著作，不管“文学”还是“学术”，都特别看重“结构”（此外还有“方法”）。这一独特的眼光，有其利也有其弊[15]。在留学期间所撰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中，胡适已经指出“太炎先生《国故论衡》之论诸子学，其精辟远过《诸子学略说》矣”[16]；上述引文更是通过“剪辑”，强调太炎先生对于九流十家均有专深研究。除单独刊行的《齐物论释》外，前三篇取自《国故论衡》，后三篇来自《检论》，合起来，确实显得很有条理与系统。如此表彰章氏，很可能直接启发了日后侯外庐的论述，后者将“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”，扩展为“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”。

突出表彰章太炎著述时之能“贯通”以及“有条理系统”，基于胡适的一个基本判断，即中国学者不太擅长需要“精心结构”的

“著作”。在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中，胡适如此评述太炎先生的贡献：

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；不但这五十年，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，可以称做“著作”的书，——如《文心雕龙》、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等，——其余的只是结集，只是语录，只是稿本，但不是著作。章炳麟的《国故论衡》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。[17]

就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完稿一个多月后，胡适在日记中重提“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”，不过这回评价标准略为放宽，中国历史上可称为“著作”的，增加到四十多种，其中近人的著述，包括《今古学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仁学》、《訄书》、《国故论衡》、《文始》等（最后两种加了着重号）[18]。

清儒做学问，为了“长驱直入”，往往采取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的策略；章太炎追求融会贯通，不能不转益多师，也不能不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。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，为推介《国故论衡》，某知音专门撰写了一则很有气魄的广告：

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，分小学、文学、诸子学二十六篇。叙书契之原流，启声音之秘奥，阐周秦诸子之微言，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，凡七万余言。昔章氏《文史通义》括囊大典，而不达短书小说不与邦典。王氏《经义述闻》甄明词例，而未辨倜语属词古今有异。陈氏《东塾读书记》粗叙九流，而语皆钞撮，无所启发。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始明转注，孔氏《诗声类》肇起对转，而段误谓转注、假借不关造字，孔氏知声有正变，通转甚繁。先生精心辩秩，一切证定。口授既毕，爰著纸素。同人传钞，惧其所及未广，因最录成袠，以公诸世。有志古学者，循此以求问学之涂，窥文章之府，庶免擿埴冥行之误，亦知修辞立诚之道。为益宏多，岂待问哉！今已出版，每册定价日币七十钱（合洋八角）。[19]

以有清一代诸多学有专长的名家，如章学诚（1738—1801）、王引之（1766—1834）、陈澧（1810—1882）、段玉裁（1735—1815）、孔广森（1752—1786）等，来作为太炎先生的陪衬，无非是想强调《国故论衡》乃“集大成”之作。而“叙书契之原流，启声音之秘奥，阐周秦诸子之微言，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”四句，相当准确地道出了此书的主要观点及基本特色——《国粹学报》上这则广告的作者，目前无法考定，但当为熟悉太炎先生思路者无疑。

其实，单以清学作为参照系，无法说清章太炎所凭借的学术资源，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。这一点，同属弄潮儿的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。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二十八章中，梁启超既指出“少受学於俞樾”，以及“中年以后究心佛典”对章太炎学术道路的牵引与制约，但更强调其“既亡命日本，涉猎西籍，以新知附益旧学，日益闳肆”。因此，所谓“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”的章太炎，真正的学术业绩还在于其“中岁以后所得，固非清学所能限矣，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”[20]。

面对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既不崇洋，也不泥古，而是“以新知附益旧学”，并借以收拾被欧风美雨敲打得七零八落的民族自信，重新构建起既基于传统而又广泛采纳西学的学术大厦，章太炎这一悲壮的努力，永远值得后人追怀。

三、在“管籥”与“堂奥”之间

太炎先生论学，门户之见非常明显。不说因一时政见歧异而攻击孙中山，或者因学派冲突而谩骂龚自珍、康有为，即便在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领域，也常见其“意气用事”。比如笃信正史，反对学界“欲穿地以求石史”，称此乃“惑于西方之说”[21]；以及认定“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”，用刻薄的语调嘲笑林泰辅等日

本著名汉学家[22]。类似的偏激言论，大都是在张扬中国文化价值的同时，流露出一种“爱国的自大”。不过，真正让太炎先生蒙受“恶名”的，并非那些近乎儿戏的“酷评”，而是《国故论衡》上卷《理惑论》之嘲笑甲骨文——因此乃太炎先生的专业，必须认真对待。一句“骸骨入土，未有千年不坏”，由此断定甲骨文乃不法商贾伪造，实在是过于草率。

此类明显的过失，固然与其高傲的个性，峻急的文风，还有喜欢语出惊人的表达习惯有关，但最重要的，还是基于其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。认准“中国之学，其失不在支离，而在汗漫”，章太炎于是极力诋毁近世学人之貌似博学与公允，实则无卓识，难自立[23]。承袭先秦学者遗风，突出自家学说，“小有异同，便不相附”，此等学术性格，自是得失互见。倘做长时段考察，学者的短处其实可以忽略（即便笑话多多），关键看其对于中国学术有无实质性的贡献。

关于章太炎的业绩，其弟子周作人有一总体判断：“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，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，超过一切之上的。”[24]这一说法，在诸多专门家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。先是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二十八章中称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